

方苞 散文选集

百花散文书系

古代部分

主编

徐柏容

郑法清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052467



百花散文书系

古代部分

主编

徐柏容

郑法清

方苞

【散文选集】

王沛霖 王朝晖 选注



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1052467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方苞散文选集/(清)方苞著;王沛霖,王朝晖编.
2版.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百花散文书系. 古代散文丛书)
ISBN 7-5306-1783-4

I. 方... II. ①方... ②王... ③王... III. 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清代 IV. I2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43290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8 插页 2 字数 166 千字

2006 年 10 月第 2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定价:53.60 元

编辑例言

一、中国古代散文源远流长,根深叶茂。它和诗歌一样,同是中国古代文学最主要、最有特色的文体形式,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璀璨宏丽的文化宝库。为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继承古代散文优良传统,以促进当代散文创作的繁荣和提高,并供广大读者借鉴欣赏,特编辑这套“中国古代散文丛书”,作为“百花散文书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出版。

二、散文文体范围,代有嬗变,古今不同。本丛书所选,以抒情、记述体等文学性较强的散文为主。入选作家上起自先秦,下迄于清代。按不同作家分别成册。各书篇目排次,原则上以写作时间先后为序,以便读者了解散文创作的发展脉络、演变轨迹。

三、本丛书每书分两部分:一为论文,内容除简介作者生平、文学活动外,着重结合选入本书的作品,分析、评述其散文创作思想特别是艺术特色、散文创作发展历程及影响。一为散文,每篇均附加题解、注释。

四、论文部分力图与散文部分互补共济,以论文帮助

读者对所选散文提高到理性认识,又以所选散文来深化读者对论文的感性认识,两相印证,使本丛书除选注散文佳作供阅读之外,在一定程度上还兼具作家论乃至古代散文史的作用,既不同于一般散文选本,也有异于一般的古代散文史而自具独有的特色。

五、每书所选散文,除了作者有代表性的名篇佳作外,还照顾到作者不同时期、不同题材、风格的文学性散文,以便体现作者散文创作发展道路。

六、题解除解释文题中有关词语、专门名词等和说明写作时间、出处、版本等外,还对作品写作背景、思想价值、艺术特色以至艺术手法等,加以简明的评述。

七、注释以疏解难字、难词以及典故、职官、器物、人名、地名等为主。对其重要者、用法特殊者,并援引出处或例句,以便读者不仅知其然还能知其所以然。

百花文艺出版社

方苞和他的散文

王沛霖 王朝晖

方苞生于清康熙七年(1668)夏四月十五日。字凤九,一字灵皋。晚年自号望溪,学者称望溪先生。安庆府桐城县(今安徽省桐城县)人。幼时就聪慧过人。五岁,父仲舒即口授经文章句。十岁时,随兄百川刻苦读经书古文,常请讲解疑难。二十二岁,岁试第一,补桐城县学弟子员(即秀才)。康熙三十年(1691),年二十四,入京师,游太学。安溪李光地见先生文叹曰:“韩、欧复出,北宋后无此作也!”长洲韩荃,文名海内,评先生文曰:“庐陵(指欧阳修)无此深厚,南丰(指曾巩)无此雄直,岂非昌黎(韩愈)后一人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三十二,举江南乡试第一。翌年赴京师,应礼部试,不第,四月南归。康熙四十二年(1703)春,复至京师,再试礼部又不第。但得与蠡县李塉刚主交游,共同讨论格物。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三十九,春,又赴京师,再应礼部试,得中进士,

名列第四。将及殿试，朝论翕然，皆以先生当推第一。先生忽闻母病，即匆匆返回江南侍候母病，竟未应试。

康熙五十年(1711)，左都御史赵申乔劾编修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子遗录》有悖逆之语，辞连先生族祖方孝标。戴名世与先生同县，亦工为古文，先生曾为其文集作序，因受牵连，被逮下江宁(今南京市江宁县)县狱，旋解送京师，下刑部狱。康熙五十二年(1713)狱决，戴名世坐斩，方孝标已前死，戍其子登峰等，先生及诸与此案有牵连者，皆免罪入旗籍汉军。康熙帝素知先生深于文学，大学士李光地也大力推荐，帝乃硃书“戴名世案内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下武英殿总管和素”。翌日，召入南书房。数日中，帝相次命撰《湖南洞苗归化碑文》、《黄钟为万事根本论》、《时和年丰庆祝赋》。每奏进一文，康熙帝辄嘉赏再三，曰：“此即翰林中老辈兼旬就之，不能过也。”命以白衣入直南书房。是年秋八月，移直蒙养斋，编校御制乐律、历算诸书，与徐蝶园同修乐律。

康熙帝命先生与诸皇子游处，自诚亲王以下皆呼曰“先生”。其时诚亲王权势炽热，性情严直，其下执事人等多被呵责，无不低首下心，唯命是听。惟先生刚直不阿，遇事持正争执。诚亲王极敬重之，并延请为王子师。

康熙六十一年(1722)，命先生充武英殿修书总裁。雍正帝即位，赦先生及入旗籍的族人尽归原籍。在雍正朝的十数年间，先生先后被授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迁翰林院侍讲学士，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命教习庶吉士，充《一统志》馆总裁、《皇清文颖》馆副总裁。

乾隆元年(1736)春，再命入南书房，命充《三礼义疏》

馆副总裁,乃上《拟定纂修三礼条例札子》,又奏请出秘府《永乐大典》录取宋、元人经说。秋七月,删定《管子》、《荀子》二书。二年(1737)夏六月,擢礼部右侍郎,诏免随班趋走,许数日一赴部,平决大事。十二月复以老病请解侍郎任。诏许之,仍带原衔食俸教习庶吉士。四年(1739)春,命充经史馆总裁。夏五月,翰林院庶常馆散馆(指在庶常馆学习之庶吉士,三年学习期满,应经考试,视其成绩优劣分配官职)。有庶吉士吴乔龄后至,先生补请其参加考试。忌恨先生的人提出弹劾,说其中有私。先生便被削去侍郎衔,但仍命在三礼馆修书。

乾隆七年(1742),先生以时患疾痛,乞解书局,回籍调理。乾隆帝许之,赐翰林院侍讲衔。四月出都归里,杜门著书,不接宾客。偶尔寻医浙东,作天姥、雁荡之游。乾隆十四年(1749)八月十八日卒。终年八十有二。

先生身修长,貌清癯,面颊微有痘斑,目光炯炯,视人如电,胆怯者见之,常顫顫不能语。为人敦厚和善,言动必守礼法,不逾常轨。待兄弟甚友爱,事父母极孝敬。其父仲舒公尝言:“吾体未痛,二子已觉之;吾心未动,二子已知之。”康熙五十年以《南山集》案牵连下狱,母老多病,并有心悸之疾。先生恐老母受惊,不敢吐露实情,给以安溪李公荐入内廷校勘,不得稽留晷刻,遂拜辞上路。及《南山集》案结,先生入直南书房,居赐第,迎母北上,其母竟然不知其子有下狱之事。先生为人廉洁,不苟受人货财。祭田租谷若有赢餘,则用之以贍合族;生徒馈赠,则予姻戚之贫者。不骄人傲物,平等待人,虽雇工仆役亦敬爱之。见一善事,闻一善言,辄反躬自问,愧未能行。如

有所规过，则诚心接受，终生铭记。长洲何屺瞻对于古文，所论与先生不合，屺瞻又好诋人短，朋辈多苦之，先生独喜闻其言，常用以反躬自省。

先生性刚直，不逢迎权贵，不冤屈好人。雍正十年（1732）冬十二月，以刑部侍郎为顺天府尹孙嘉淦不为某亲王所喜，某亲王派人来见先生，授意急劾奏之，并许以先生代替孙嘉淦的职务，先生坚决予以拒绝。来说：“如果不从，祸将及身。”先生面临如此威胁利诱，仍然以死相拒。不久，孙嘉淦竟被诬以贪赃枉法被捕下狱。先生走访相国鄂尔泰说：“孙侍郎以非罪死，公复何颜坐中堂！”鄂尔泰因以百口保孙嘉淦，孙始得幸免于难。

先生好面折人过，不留情面，因此，往往与朝中同事不合，甚至有忌恨、排挤之者。故先生晚年所奏札子，下六部九卿议论，众皆合口梗之，甚至有人出来和他为难、弹劾他。一次，吏部欲挑选祭酒（国子监祭酒，国家教育管理机构 and 最高学府的主管官），乾隆帝沉吟道：“是官应使方苞为之，方称其任。”左右众人无一应者。乾隆四年五月被削去礼部侍郎衔，也是被忌恨者诬陷、攻击所致。

先生在职期间，爱国爱民，忠公守职。先后与相国蒋廷锡、张廷玉、鄂尔泰等论征伐、制驭准噶尔泽旺事宜；多次上疏朝廷要求推迟向农民征收地丁银两日期，以减轻农民困苦；希望制定常平仓谷的巢余办法，以便及时拯救灾民，避免贪赃枉法弊病；祈求恢复河南漕运，以利黄河以南五十州县的经济的发展；要求及早备荒，并提出以工代赈办法；建言因民生日匮，菽米不足，请禁烧酒，禁种烟草，禁谷米出洋；请求国家矫除积习，兴起人才，为朝廷所

用……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或振兴国家的关键性问题,先生能密切注意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足见先生之体察民情、关心政事,希望国家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之意。

先生性聪敏,四岁即能属对。一日,其父鸡鸣起身,值天大雾,乘兴口占一联云:“鸡声隔雾”,命先生接对。先生应声对道:“云气成龙。”对联是比较工整的。五岁,由父亲口授经文章句。七岁时,一日,乘父亲外出,与兄百川共启其父固藏祖传旧版《史记》潜读之,爱不释手。后来先生于《史记》多有所得,即此发其端绪。十岁,随兄百川读经书古文,百川为讲经书注疏大全,择其是,辨其疑,相与博究经史百家之书。十一二岁时,对于《易》、《诗》、《书》、《礼记》、《左传》诸书都能背诵。二十岁后,循览《五经注疏大全》、通志堂《宋元经解》,遍读唐宋以来诂经之书,作《读尚书偶笔》、《读易偶笔》、《朱子诗义补正》。康熙三十年(1691),先生入京师,经学家万斯同降齿德与之交。在万先生影响下,先生于是辍古文之学,一意讲求经义,开始读宋儒之书。故先生与姜宸英、王昆绳等自论行身祈向,曰:“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

先生在刑部狱中,悉心研究《礼记》,入直南书房后,于康熙五十五年著成《春秋通论》。其后供事书局,公事之暇,辄致力于《春秋》、《周官》,前后几三十年。康熙五十九年著《周官集注》成,翌年著《周官析疑》成。乾隆元年充《三礼义疏》馆副总裁,乃拟定纂修条例,上疏请鉴定施行,对三《礼》也全面进行了研究。

先生幼儿时即能属对，青年时所交多楚越遗民，重在文藻，耳濡目染，默化潜移。又其父仲舒与钱澄之、杜苍略诸先生交游，常以诗唱和，先生爱其铿锵、抑扬顿挫，亦欲仿效为之。其父告诫他说：“毋以为也。是虽小道，非尽心以终世，不能企其成，而耗少壮有用之心力，非躬自薄乎？”因此先生就绝意不在诗歌方面用心了。今《望溪先生文集》中诗歌绝少，也不见得出色，大概就是这个缘故吧。

先生于十岁时开始学作时文，即八股文，前辈见而异之。杜苍略见其《读孟子》文，评曰：“前儒所未发，却妇人小子所共知。”礼部尚书韩文懿公菱评其时文曰：“义理则取熔六籍，气格则方驾韩、欧。”进士张彝叹评曰：“探孔、孟、程、朱之心，撷左、马、韩、欧之韵，天生神物，非一代之珍玩也。”乾隆元年，帝亦认为先生工于时文，命选明代及本朝诸大家四书制艺（即八股文）数百篇颁布天下，以为举业准的。先生于乾隆四年选成，奉命颁行天下。然而先生始终认为时文“尤术之浅者也”。他说，古之圣贤有高深的思想修养，所作所为，对人们是很大的功业，所以史臣记录下他们的事业，学者传流着他们的言论，并奉以为经典，与天地流传不朽；次一等的，如左丘明、司马迁、班固，能通古今之变，存一王之法，所以他们的记事之文传；荀卿、董仲舒，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以待后之学者发扬光大，所以他们的道古之文传；管夷吾、贾谊之流，畅晓治国安邦的事务，所以他们的论事之文传。这些人都不是故意要写文章流传后世的。韩愈、欧阳修写了很多文章，也不是想当一个文学家，所以他们的文章规模宏大，

无人能及。南宋以后，作者皆欲仿效前人，唯恐不似，用框框把自己框起来，文章哪能不文笔滞涩、气度狭小呢？至于明清的时文，尤其是一种格调低下的文体，它束缚人们的思想，于世无补，不宜提倡（参见《杨干木文稿序》）。在时文是科举考试的国颁标准文体的当时，先生敢于提出这样大胆的意见，没有一点气魄是不可能的，而先生的这一意见是中肯的、极有价值的。

先生所提倡的是古文。他论古文，必曰“义法”。他说：

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又书货殖传后》）

由此可见，先生论文章，不尚空言义理，不使流于抽象空疏，而要求言之有物，要求要有实际的社会内容；另一方面，文章所言的义理，意在为人们所理解，为社会所实用，要达到这个目的，不能语无伦次、杂乱无章，而要言之有序，即要求文章要讲究好的表现方法。“义”即指的是文章的思想内容，“法”即文章的表现形式。所谓“义以为经而法纬之”，就是要求文章要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高度统一。

先生所主张的“义”的主要内容，不外是儒家所讲的纲常大道，即封建统治阶级所提倡的伦理道德。他说：

若古文，则本经术而依于事物之理，非中有所不得可以为伪。韩子有言：“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兹乃所以能约六经之旨以成文，而非前后文士所可比并也。（《答申谦居书》）

盖古文所从来远矣。六经、《语》（《论语》）、《孟》（《孟子》），其根源也。得其支流而义法最精者，莫如《左传》、《史记》……，其次《公羊》、《穀梁传》、《国语》、《国策》……。唯两汉书疏及唐宋八家之文，篇各一事，可择其尤而取至约，然后义法之精可见。……学者能切究于此，而以求《左》、《史》、《公》、《穀》、《语》、《策》之义法，则触类而通。因是以求六经、《语》、《孟》之旨而得其所归，躬蹈仁义，自勉于忠孝，则立德立功，以仰答我皇上爱育人才之至意者，皆始基于此。（《古文约选序例》）

这些都说明了先生坚持“文以载道”、“文以明道”之说，认为文章本源于儒家经典，应以儒家的道义，特别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春秋》之义为根柢。所以《望溪文集》中到处流露着对忠、孝、仁、爱的歌颂，对贞女烈妇的赞扬。其所表现的这些封建伦理思想，其本质当然是维护封建阶级的统治，所以是并不足取的，是应该批判的。然而望溪先生的义法理论，就其文学创作必须言之有物的主张，强调文学作品必须具有真实的社会内容，必须为社会服务这一点说，无疑是可取的。

望溪先生古文中反映的思想，除封建道统之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的伦理纲常、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外，

尚有其他一些思想。首先是民族主义思想。清王朝以满族入主中国,不仅对汉民族的反满行动实行无情镇压,即使是对反满思想情绪也是非常警惕、戒备的。特别是知识分子之言论、文字,更加注意,稍有违碍、不敬,就要加之以刑戮,所以大兴文字之狱。望溪先生就亲身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戴名世《南山集》案的文字狱。出狱以后数十年,心中时有余悸。然而他的民族意识虽然微弱,但是始终未能泯灭,若隐若现地反应在文集中。如念念不忘明遗民的民族气节。《田间先生墓表》说:

先生形貌伟然,以经济自负,常思冒危难以立功名。及归自闽中,遂杜足田间,治诸经,课耕以自给。……先君子闲居,每好言诸前辈志节之盛,以示苞兄弟。

田间先生姓钱名澄之,生于明朝末年,所谓“冒危难以立功名”,所谓“志节”,所谓“杜足”“课耕”,难道不是民族思想的体现吗?

先生还歌颂黄道周英武不屈的气节。黄道周为明天启进士,明福王时官礼部尚书,唐王时为武英殿大学士,以抗清兵失败而死。先生描写他被关押在监狱中及就义前的坦荡胸怀,从容不迫,表现先生心中的敬仰之情:

及明亡,公縶于金陵。在狱,日诵《尚书》、《周易》,数月貌加丰。正命之前夕,有老仆持针线向公而泣,曰:“是我侍主之终事也。”公曰:“吾正命而毙,

是为考终，汝何哀？”故人持酒肉与诀，饮啖如平时。酣寝达旦，起盥漱、更衣，谓仆某曰：“曩某以卷索书，吾既许之，言不可旷也。”和墨伸纸，作小楷，次行书。幅甚长，乃以大字竟之，加印章，始出就刑。（《石斋黄公逸事》）

写明朝兵部尚书、大学士孙承宗每天吃糙米饭共历十九年的事，表现孙承宗的远见卓识，赞扬他合智谋忠勇之士以尽其材，用危困疮痍之卒以致其武。把他比作汉代的诸葛武侯，反映先生对抗清名将的景慕。（参阅《高阳孙文正公逸事》）

望溪先生文章还揭发了政治的黑暗，官吏结党营私、漠视人民疾苦，权势之家的危害人民等问题。如《狱中杂记》揭露了监狱随意钩致无辜的人入狱，因为这样可以有办法勒索囚犯的财物；又为了勒索财物，所有行刑的狱吏都要滥施毒刑；还有骇人听闻的偷梁换柱的情形，把不该处罚的人拿去顶替重罪的人处死。至于揭露权臣结党营私的，如康熙二十三年，在开海口工程中，相国、河督、工程指挥之间，各结私党，互相掣肘，互相倾轧，诡施妙技，巧取国库银两私分。（见《记开海口始末》）至其揭露权势之家侵害人民的，如《陈驭虚墓志铭》云：

少好方（医术），无所不通，而独以治疫为名。

……诸势家敦迫之使廩至，使者稽首阶下。君伏几呻吟，固却之。退而嘻曰：“若生，有害于人；死，有益于，吾何视为？”

陈驭虚对仗势害人的人的办法,使人觉得痛快,不能用一般的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去要求。先生揭露官吏漠视人民疾苦的如《逆旅小子》:

逆旅小子形苦羸,敝布单衣,不袜不履,而主人挞击之甚猛,泣甚悲。叩之东西家,曰:“是其兄之孤也。有田一区,畜产什器粗具,恐孺子长而与之分,故不恤其寒饥而苦役之;夜则闭之户外,严风起,弗活矣。”余至京师,再书告京兆尹,宜檄县捕诘,……孺子果以是冬死,而某亦暴死,其妻子、田宅、畜物皆为他人有矣。叩以“吏曾呵诘乎”?则未也。

康熙时期,史称盛世,但是其官吏却视民命如草芥,可见其吏治仍然很黑暗。

先生揭露这些弊政,也是希望政治清明,国强民安。所以他还提倡选贤任能,以整肃封建统治秩序。他说:

监司之体,在辨属吏之清浊,而迩来廉辨敏肃者,尤当观其所由,以为义之所宜,心之所不安而然者,必能明政恤民,久而不变。……位者天位,职者天职,其贤者能者,虽有憎怨,必释吾憾而任举之,其不为民所赖者,虽吾近亲尊属,必斥而去之。壹以官为准,壹以人为衡,吾之爱憎喜怒,无几微可杂于其间。(与《陈密旃书》)

先生不但口头这样说，而且行动上也这样做了。有这样一个事例：

往者，安溪李文贞巡抚畿内，仆有亲故为属吏，公将擢之，仆力言其非人。河间王振声曰：“子与夫人终不相见乎？”仆曰：“何为其然。使无播恶于众而自驱于罟擗陷阱之中，乃所安全而爱厚之。”（《与陈密旃书》）

望溪先生所主张的义法，其在“法”方面的主要内容为：

一曰内容简洁。要求选材精当，芟刈繁芜，达到精炼雅洁的境界。先生论选材有云：

《萧相国世家》所叙实绩仅四事，其定汉家律令及受遗命辅惠帝皆略焉。盖收秦律令图书、举韩信、镇辅关中三者，乃鄂君所谓万世之功也。其终也举曹参以自代而无少芥蒂，则至忠体国可见矣。至其所以自免，皆自他人发之，非智不足也，使何自觉之，则于至忠体国之道有伤矣。故终载请上林空地械系廷尉，明何用诸客之谋，非得已耳。若定律令，则别见曹参、张苍传。何之终，惠帝临问而举参，则受遗命不待言矣。盖是二者，于何为顺且易，非万世之比也。（《书萧相国世家后》）

文中所论《史记·萧相国世家》所叙萧何平生业绩，仅举